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十 九 年

第一一七三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纽 约

目 次

	页 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73).....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73)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拉柴维尔)、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

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 和 Add. 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按安理会前已作出的决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邀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肯尼亚和中非共和国等国的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前面指定的席位就座，并参加讨论。

应主席邀请，*M.O.A.H.* 阿迪勒先生(苏丹)、*M.* 阿什卡尔先生(几内亚)、*K.* 博齐约先生(加纳)、*P.-H.* 斯巴克先生(比利时)、*C. D.* 加纳奥先生(刚果，布拉柴维尔)、*M.* 亚齐德先生(阿尔及利亚)、*M.* 巴先生(马里)、*M. T.* 伊宗布伊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J. A.* 瓦舒库先生(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 *J.*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到安理会议席前指定席位就座。

2. 主席：我们继续对问题进行审议。第一个要求发言的是比利时外交大臣，现在请他发言。

3. 斯巴克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各位先生，象其他发言人一样，我感谢你们在这个时候让我发言，因为我必须承认，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两天。我竭力克制自己才顶住了那股雄辩的洪流；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中我们都被这股洪流淹没了。这股洪流带来了漫无边际的侮辱、粗暴的攻击和谎言。它也暴露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和屈辱的自卑感。同时——而这是使我感到最烦恼、最痛苦

和极为关切的——在我前头发言的人的讲话中，有时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对抗的、不信任的和几乎是仇恨的情绪——一种接近于早已被严厉地斥责和抨击了的种族主义情绪。

4. 我听了七、八次的指控，但我不是作为被告来到这里请求减轻案情，也不是请求法院宽大处理。我带着正义和良心的力量来到这里，确信这是我国大多数舆论所赞许的；我还相信，这也是全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公开的和心照不宣的赞许所鼓励和支持的。我来这里试图坦率地同时希望也清楚地说明比利时政府有必要作出了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的各种理由。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只是经过小心谨慎地权衡一切有关因素之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我们这样做，已经充分地知道会遇到国际上的非难。当我们决定采取斯坦利维尔行动——关于这个行动我很快就会谈到——时，我们已认识到它会惹起一些象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类的种种言论。

5. 我听了那些意料中的言论，再一次认识到，运用激烈的形容词往往表明论证无力，而搜索强硬的词句比之找到有力的论据要容易得多。

6. 如果我没有在这些指控本身以外察觉一些更为严重的东西，那么，我会出于习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去听那一切的。但我觉得在这些言论中有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意图，要把非洲同欧洲分隔开来，也许甚至要使黑人反对白人。主席先生，那是一种双重的和真正的危险，而那正是我们迄今听到的言论的含义中确实严重的东西。

7. 这些言论是感情激动的，但我将极力避免用激动的感情来回答所听到的那些感情激动的言论。我将尽量尊重事实，并就事实发表意见。

8. 在这个发言中，我要讲到斯坦利维尔行动，还要讲到比利时在刚果的政策、那个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所在。

9. 就斯坦利维尔而言，我声明——我相信我要向所有持客观态度的人证明——斯坦利维尔行动不是一个军事的行动。它不是一个帮助刚果国民军的问题。它不是征服或保持某一块领土的问题。它是营救

其生命受到威胁的一千五百人到两千人的问题。它是要拯救被叛乱当局当作人质并且受到囚禁、威逼和殴打的人。我的对手们对我说，那不是事实，那不是一种营救行动，而是预谋的军事侵略。你们在过去两天中已经反反复复地多次听到这种指控了。

10. 在我前面的那个发言人，那个朝这方向走得最远的人，就是刚果(布拉柴维尔)的代表。他不但谴责比利时和美国以及作为其帮凶的联合王国，说它们处心积虑地预先策划了一次军事侵略。他还特别针对比利时，说我们制订了一个从叛军占领地区撤出白人的计划，为的是以后能更方便地用机关枪攻击那个地区，屠杀黑人。

11. 我敢说刚果(布拉柴维尔)的代表断不能拿出那怕是些微的证据，些微证据的苗头，些微的证据来支持他那种卑鄙的非难。我相信人们以为别人有的想法，只是他们自己能够想得到的一些观念。所以，我让刚果(布拉柴维尔)的代表去对待他自己的良心和他那诽谤性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好了。

12. 在这里，人们一直在审究一切的目的意图，人们也讲了许多东西，而从来没有试图加以证实。我的愿望是按照事实，逐步地向大家说明在斯坦利维尔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13. 今年七月，叛军向斯坦利维尔推进。从那时起，鉴于在刚果其他地区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就非常担心。正是从那时起，在八月初，在斯坦利维尔还未被叛军占领的时候，我们就试图组织最初的撤退。在斯坦利维尔的比利时领事提出了派遣飞机的特别要求；有一百五十人搭上了飞机离开了那个城市。这些人不全是比利时人，还有其他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也有若干刚果人，他们是刚果国民军军官的妻子和儿女。但很遗憾，其他的人拒绝离开。这是我多年来不得不应付的情况：每当我试图解决刚果的一桩事件时，特别是比利时人，总是要求留在那个国家，因为他们喜欢它，其中许多人已把它作为第二故乡了。尽管我们把叛军——他们常常是管带无方和行为莫测的——到来所造成的局势的危险性正式通知了他们，但大多数白人仍然留在斯坦利维尔，拒绝撤退。

14. 阿尔及利亚代表表现了多少有点荒谬的想象力，他竟敢说什么比利时人留在斯坦利维尔是比利时政府的诡计，说什么我们鼓励自己的同胞留在那里是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在准备采取那个解放行动了。我必须承认，阿尔及利亚代表在提出那个理论之后愿意作出让步。他承认那个理论也许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承认他无法证明他的论点。对于他那种追求客观性的努力，我决不想放过这个机会而不向他表示感谢。

15.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比利时人、其他白人和许多外国人仍然留在斯坦利维尔。到了八月，我们有明显的理由表示担心了，因为叛乱当局公开地、正式地提出一种理论，说什么外国人，特别是比利时人和美国人，不但是战俘，而且还是人质。

16. 虽然在我前面发言的那些人装作不知道这个事实，但它却是我们采取斯坦利维尔行动的理由。有一种见解认为，一个政府，不管它是合法的还是叛乱的，为了推行它的政策，有权拘捕无辜的男女和儿童，作为人质和抵押品。我想知道，有哪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胆敢为这种见解承担辩护的责任？扣留人质的做法是违反任何国际法的，而如果说这种做法是违反任何一条人类所制定的法律，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夸大。对于那种认为可以扣留无辜的男女和儿童——就算他们甚至是反对他们的政府的政策的——作为政治交易的抵押品的见解，怎么会有可能证明它是正当的呢？阿尔及利亚代表硬说这是西方通常的做法；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比利时逮捕了比利时人，甚至德国人；他还说比利时政府把这些人运送到远在法国南部的地方去。那是确实的：一九四〇年初，我们逮捕了我们认为是第五纵队特务的那些比利时人和德国人。但是，在什么时候比利时政府把这些被认为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当作人质呢？我可以告诉阿尔及利亚代表，他的发言是十分不准确的。事实是，斯坦利维尔的局势由于不断恶化而变得更为严重了。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遭到逮捕，他们受到迫害、威胁和侮辱，最后被囚禁起来。

17. 就是在这个议席上，加纳代表竟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斯坦利维尔谁受到威胁？他们是受到谁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辩论中，一个想要发言的人，竟

敢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一件相当离奇的事情。在斯坦利维尔谁受到威胁？一千五百个外国人。他们受到谁的威胁？受到叛乱当局的威胁。这就是对那离奇的问题清楚的回答。

18. 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是怎样感到越来越担心的。我这里的卷宗里有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发自斯坦利维尔的——也就是由叛乱当局发出的——那些电讯。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比利时伞兵降落的前夕。

19. 国际红十字会在十月二十九日给冲伯总统的复信中说，国际红十字会要派一位观察员到斯坦利维尔去，但是，经过了几周的努力，还是没有得到叛乱政府的许可。这个行动是叛乱当局对外国人的态度变得强硬以后所采取的。刚果政府的监听哨截获奥伦加将军发出的无线电讯，他要求各地区的指挥官把本地区的所有外国人软禁起来。在斯坦利维尔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十月三十日收听到下面的电讯：“我们不能再保证比利时和美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了。”

20. 十一月二日，在给恩克鲁玛、本·贝拉、纳赛尔和塞古·杜尔等先生的无线电讯中，格贝尼威胁地声称要实行焦土政策。他说：

“人民解放军一向保护外国人，但它不再保护某些国家的侨民，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在援助帝国主义分子 M. 冲伯。”

21. 十一月五日，格贝尼“总统”宣称：“由于空袭……”——先生们，我向你们确实保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斯坦利维尔并没有遭到过任何空袭——“由于空袭，现在所有在解放区的美国人和比利时人都作战俘看待了。”

22. 十一月十八日，格贝尼宣称：

“有关战俘的谈判应是几天内的事而不是几周内的事，因为人民主张处决卡尔逊少校的愿望必须受到尊重。”

23. 十一月二十日，格贝尼在电台上广播说：“斯坦利维尔一遭到攻击，便会将卡尔逊少校处决。”

24. 最后，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广播又说：“美国和比利时军队已经向我们进攻了。人民的忍耐是有限

度的。人民政府已把比利时和美国侨民迁离斯坦利维尔。”

25. 十一月二十三日有一份电讯——我是在二十二日便已听说了的。如果我逐字引述这份电文的原文，我是会感到羞耻的。那个叫做格贝尼“总统”的人，在电文中威胁说要把外国俘虏“吃掉”，或者在他们的门口放上几桶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

26. 我们有没有理由表示担心呢？我们有没有理由为我们同胞的命运感到不安呢？

27. 有人告诉我：“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在斯坦利维尔没有人被杀害。”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争辩。事实是——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只有一个人被杀害。而在这个严酷的时刻，一个人之死不幸地是这么微不足道，竟致后来连提都不再提了。但同样也是事实的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整个叛乱分子占领区也有很多人被杀害，而且经常是被用残酷的手段杀害的。我说不出来究竟有多少，大概总有几十个吧。

28. 我这里有一个记载发生恐怖事件的卷宗。当然，只要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不全部怀疑的话，我不准备使用这些材料，或者甚至不打开这个卷宗。为什么我不准备打开这个恐怖事件的卷宗呢？因为即使为了捍卫善良而正义的事业，我也不想扩大在黑人同白人之间今天可能已经存在的鸿沟；因为即使为了利用耸人听闻的论证，我也不想冒挑动种族敌对情绪的风险。但遗憾的是，我们早已开始看到这种敌对情绪的存在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有我所尊敬的非洲朋友。我想避免跟他们断交。除非到了最后的时刻，尽了一切的努力，我不愿意把这些令人毛骨耸然的东西拿出来。

29. 此外，我不准备这样做，因为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伤心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幸得很，白人再也没有资格宣讲如何消除人类的恐怖行为了。自从出现过布肯瓦尔德和奥什维茨集中营以后，白种人中谁也不再有这样做的权利了。我真诚地相信，从来就没有犯罪的种族。我真诚地相信，从来甚至就没有犯罪的民族。我真诚地相信，只有被引入歧途的和可卑的人们。过去，希特勒是个可卑的人；今天，很对不起，格贝尼也是个可卑的人。

30. 正是那个我刚才提到的电文的发电人，今年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伞兵部队降落在斯坦利维尔之前的十天，竟敢在他的报纸殉道者报上写道：

“有三百多个美国人和八百多个比利时人在我们手里，他们已被软禁在安全的地方。只要稍一轰炸我们的地区或我们的革命首都，我们就要成全他们回归天国；也就是说，他们全部将被杀光。”

而且——在这里我得请求我所尊敬的黑人朋友宽恕我——在同一篇文章里，这同一个人又这样写道：“我们要用美国人和比利时人的心来做祭献之物；我们要用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皮来做衣服穿。”

31. 你们真的认为我们没有理由表示担心吗？那么，请问，在这个会上谁敢负责替写或说这些话的人辩护呢？为他辩护的人也就是要替他的骇人听闻的和穷凶极恶的挑衅行为承担责任。事实上，这些话让那些不幸的盲从的狂热者们读到，除了导致悲剧以外，还会产生什么呢？

32. 尽管我不想太过卷入非洲的内部事务，但我还是要大胆问一问：把这样的一个人捧为非洲民族主义的象征，这岂不是一桩异想天开的糊涂事？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而且应该认真加以考虑。

33. 外国人的生命确实在危险之中，后来我们从斯坦利维尔和波利斯所获悉的一切，都证实了我们所预料中会出现的最可怕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有人说：“什么都不用干，冒险让他们被杀害罢。”要不然，就冒险，是的，冒险试一试救他们吧。我当时知道这是冒险，而今天则知道得更清楚。

34. 这是一个风险，因为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伞兵行动，还因为——请相信我，我们是早已想到这一点的——我们面对两种可能，各有各的危险，这是能够明显地事先看到的。如果我们决定采取行动，要么是可能我们到达得太晚，那就要落空；要么是——而这是确实的，有人也那么说过——可能我们一发动伞兵行动，那就可能为我们所担心的悲剧发出信号。请相信我，当时我们已考虑到这一切，而且仔细权衡过一切的可能性。在决定空降之前，我们想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力图使在叛军手中的外国人获释。我们

曾向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国际组织——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接过头。我们也曾同所有非洲国家的首脑联系过，他们许多人对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担心都表示理解。我们曾亲自同斯坦利维尔当局交涉过，而且正如我以后还要说明的，那时我似乎有些理由希望格贝尼先生有一点明智和人性。可是，这一切都落空了。

35.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行动得太早了。正在内罗毕开会的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快要成功了。我现在不是要跟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的成员辩论。我以后还要说明我对这一点的看法。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的确认为，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内罗毕开始的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凡是能够预见到的，都果然发生了：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当局果然想利用人质来进行讨价还价。当美国大使被派去执行使命，即试图使坎扎先生同意释放那些无辜的人们时，坎扎先生在答复中提出了政治条件：首先必须实现停火。可是，既不是美国政府——我相信它会允许我这样说——也不是比利时政府能够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实现停火。能够决定停火的只有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它那时并没有决定同意停火。我认为我现在这样说并不是在泄密。那时它的军队就在斯坦利维尔的门口，而从金杜向斯坦利维尔推进实际上没有碰到困难。那一天无法使冲伯停止他的军队前进并同意为斯坦利维尔的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进行政治交易。

36. 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我们尽可能等待到最后的时刻。我们从比利时到了阿森松；在那里英国人接待了我们，那是真的。我们不想直接到刚果去，因为——你们对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但我认为多数人是会相信的——我们当时希望，除非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决不采取行动。我们让伞兵部队停在阿森松岛。后来，我们感到局势越来越严重，从叛乱地区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使人不安，我们才决定再前进，这也是真的，我们让比利时部队飞往卡米纳。

37. 我得承认，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当我获悉前面提到过的格贝尼先生的电讯时，我考虑能否再等待下去，考虑了肯定不止一个小时。尽管如此，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在最后的时刻不会出现奇迹，于是，我们又等了二十四个小时。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的

最后时刻，我们——美国人和比利时人——才决定：伞兵部队将在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在斯坦利维尔空降。为什么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黎明呢？这是在全事件中我的对手们可能找出一些争论的地方，但我的说明将会很容易地解决任何这类的争论。选择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是因为自从我们面临这个局势以来，我们就想知道，对在斯坦利维尔的外国人来说，什么时候是关键的时刻，在什么时候格贝尼先生和他的同伙要实现他们的威胁。比如在金杜，不幸得很，我们就有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些经验。我们没有在金杜采取伞兵行动。那里的外国人，特别是比利时人——在金杜的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是比利时人——仍然得救了，但那只是在最后的时刻他们才得救的。他们原先被拘禁起来，并受到最直接的威胁；只是由于刚果国民军的迅速到达，才把他们救了出来。我们当时所考虑和担心的是，刚果国民军一到达斯坦利维尔的外围，就要开始战斗。我们不知道刚果国民军能否打胜仗；我们不知道要多少个钟头，或者甚至多少天，战斗才能结束；我们想，这时候就是外国人的生命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特定的时刻在斯坦利维尔空降，也是为什么我们甘愿采取这一行动所牵涉的一切危险的原因。

38. 有些发言的人说，正是我们要对在斯坦利维尔发生的屠杀事件负责。对我的尊贵的对手们我要说：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也对我们自己的同胞负责。但我们的良心并不觉得负疚太深。因为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在斯坦利维尔得救的外国人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确信，如果不是那一次行动，他们就会被杀害了。当然，我悼念——我十分悼念——那些斯坦利维尔的遭难者的厄运；但是，请告诉我，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而又有好几十个外国人在斯坦利维尔被杀害，那么，美国和比利时的负责当局，其处境又将会是怎样的呢？无疑地，我们会深感悔恨，因为我们明知我们本来是能够营救他们的，只是由于不敢承担政治责任才使他们遭到屠杀。

39. 我们在波利斯实行了第二次行动，那也是在犹豫了好久之后才开始行动的；因为从军事的角度看，比起在斯坦利维尔，这次行动更为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决定干下去，因为从波利斯传来的消息实在惊

人。如果你们要我把发生的恐怖事件的记录拿出来，我可以证明我们是有理由感到震惊的。我们派遣了大约半数的伞兵到波利斯去。他们在飞机场着陆，执行了自己的任务，他们释放和营救了数百名外国人。所有在波利斯的外国人都由于我们再一次敢冒风险而对我们表示感谢。

40. 我们于二十四日在斯坦利维尔着陆，二十七日全部返回卡米纳；到了二十九日，被派到斯坦利维尔和波利斯的伞兵便再没有一个留在刚果的土地上了。营救行动就此结束了。

41. 这些都是事实，就是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在心理上和实际行动上全部事态的发展过程。我可以确实告诉你们：一个了解实情而又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在听到对他从未有过的想法和意图进行指控时，那是会令他极端伤心和痛苦的。

42. 我们的对手们说，那是预谋的侵略。预谋的侵略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43. 我们离开了波利斯。在我们占领期间，在它的周围三百多公里以内连一个刚果军队的士兵也没有。那时如果我们曾经打算给刚果国民军以任何援助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飞机场构筑工事，等待军队到达。当三、四百名在波利斯的外国人被营救和撤离出来以后，我们毫不停留，即刻离开波利斯。根本不存在刚果国民军利用比利时空降的机会派遣一兵一卒到波利斯来的问题。象这样的行动会是在进行一种军事行动的政府的行动吗？

44. 当战斗仍在进行中，我们离开了斯坦利维尔。伞兵部队把已经占领的飞机场突然放弃，或许会给刚果国民军造成更多的困难。我们从来没有打算留在那里让刚果军队最后接管这个市镇，并巩固他们自以为取得了的胜利。我们离开了，把这个飞机场放弃了，战斗则还继续在那里进行了好几天，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正当我们把所有的空降伞兵撤离刚果的时候，刚果的内战不幸地还远远没有结束。关于内战，我以后还有话要说。

45. 那么，人们怎么能够老实地、有理由地坚持说，这是一种军事行动呢？

46. 我们用了“人道主义的行动”这样的措辞，而我们的对手们却嘲笑这一说法。

47. 我必须承认，他们找到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论点。他们说，那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动，证据是在刚果的东北部现在还有许多外国人，特别是比利时人，而我们却放弃不管，让他们听天由命。因此，他们说，这显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动。

48. 我想知道，如果我们为了营救所有的外国人，直到最后一个，而在刚果逗留好几天，或者甚至好几个星期，我们的对手们又会怎么说。

49. 我们把在斯坦利维尔降落那天的情况向许多国家的政府作说明时，它们对我们说：它们理解我们的行动，但敦促我们不要在那里逗留，一当外国人已经被营救出来，就尽快离开。

50. 由于这个意见和我们打算要做的完全相符，所以我们照此行事，没有什么困难。不过，刚果东北部地区的比利时人和其他白人确实至今尚未——我怎么说好呢？——完全撤出。请想一想，万一比利时的伞兵现在仍然留在刚果，我会处于怎么样的境地。的确，我们离开了，理由是：再采取一次空降行动，也不可能将仍然留在东北部地区的比利时和其他外国人营救出来。我们不可能用我们所派遣的四百伞兵去完成这个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几千人才行。我们能在斯坦利维尔和波利斯这样做，是因为那里的比利时人很集中，外国人很集中。仅斯坦利维尔一处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波利斯则几乎有四百人；再则，因为在那里有那些可用的飞机场着陆，就有在几小时内完成这个行动的可能性。

51. 另一方面，东北部地区的比利时人和其他外国人散居遍处远近几百公里。我们要有全副武装才能着陆，而着陆的伞兵还要跋涉经过二、三百公里的广阔丛林地带。要四百个伞兵完成这任务是不可能的。要那样做就得要有几千士兵才能着陆，才能实行这一行动，而这行动可能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中。同时，行动的性质就会同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

52. 最后，胆敢坚持这是预谋的侵略的说法是真正地不顾真凭实据的诡辩。侵略者通常不会宣布他们的计划。只要阅读一下比利时常驻代表洛里

丹先生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S/6055〕,¹ 就可以体会到早已有这个行动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读了这封信的那些人对它,特别是对下面这一段是怎样理解的。

“经与刚果政府磋商并应它的请求,已经采取初步措施,以应付有必要撤走人质的可能性。”

53. 当比利时的空降部队在阿森松岛,而世界报刊早已报道了这一事实,同时我国常驻纽约的代表亦已表明,要是局势恶化,我们就不得采取非常措施时,读过那封信的那些人可能会想些什么呢?那些今天在这里抗议和指控预谋侵略的会员国当时真的不理解我们间接地却是十分清楚地宣布了我们即将采取行动吗?如果我们果真早已策划了军事目的的任何侵略,难道可以设想我们会这样做吗?

54. 还有一个论点,一个伤害我的感情的论点,整天都在一个接一个的发言中重复,用词越来越粗暴和带侮辱性。我所指的论点就是把整个波利斯行动说成是种族主义的性质的;说比利时人肯定是对世界已经发生了伟大运动毫不理解,而美国人可能也不理解;说我们在制造差别,要是我们这样做的话,那就会在一种人的生命和另一种人的生命之间造成令人厌恶的歧视。我们听到这样的陈词滥调:“一个白人的价值等于两个黑人的价值”,“黑人的血也象白人的血一样红”。

55.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点。可是你们要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我们实行一次行动,一次军事行动,按照我们的政治概念去干,来恢复斯坦利维尔的秩序,并断然执行吗?我想知道,如果我们那样做了,你们又会说些什么。

56. 不是的,我们并不认为一个白人的价值等于两个黑人的价值,也不认为一个白人的血比一个黑人的血更珍贵。比利时政府对已经派往刚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负有特殊责任,那是事实。我们救援的那些比利时人,实际上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我国的技术援助人员,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兽医,我们的医生,所有那些正在帮助刚果政府克服它面临的困难问题的

人员。他们是我们请去的。因为我们对那些人负有一种特殊责任,所以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作一次特殊努力。

57. 我们在营救行动中,真把白种人和有色种人区别开来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从斯坦利维尔撤出的所有的人中,至少有四百名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还有二百名刚果人。而且我必须说明:迫使我们停止撤出刚果人的原因是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干涉。刚果政府由于它自己将要解释的某些原因,不允许继续撤退刚果人。

58. 那就是这个所谓“种族主义”行动的真相。

59. 最后一点,尽管没有明显说出来,比利时部队受到含糊其词的控告,说他们犯下了大屠杀的罪行。那些提出这种控告人——我被迫说一句——蓄意歪曲了事实。他们把刚果国民军的行动,或许还有雇佣军的,同在斯坦利维尔空降的比利时伞兵部队的行动混为一谈。我知道,你们对这一点不会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在作出采取行动的决定的那一天,我接见了要去指挥那次行动的军官。我极为强调地劝告他,对他说:“我请求你,除非为了搭救处于危险的人和为了合法的自卫,切不可使用武器。”

60. 从我所接到的报告中,我可以这样说,被比利时部队杀死的叛乱分子为数并非微不足道——我不敢用这个词,因为我知道,即使对一个人的死亡说成是“微不足道”,那也是极为残酷,极为可憎的——但是,数目很小。而且,如果说到目前还在刚果继续进行的屠杀,那是刚果人之间发生了恐怖的自相残杀的战争的结果。在叛乱分子那方面来说,那是恐怖的战争。我必须承认,对叛乱分子的报复行动有时也是恐怖的。因此,我坚信,问题在于设法结束战争。

61. 我想说——就只说这么一次——雇佣军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同利奥波德维尔政府解决的问题。这件事要在非洲统一组织和冲伯先生之间进行讨论。比利时政府对于招收雇佣军并无责任。我们尽力阻止比利时人去当刚果国民军的雇佣军;我们知道受牵连的危险。但我们不能不承认,采取行动对付雇佣军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是从许多条路绕道到达刚果的。

62. 以上是我必须说的有关斯坦利维尔行动的事。我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在我之前的任何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发言人知道得更清楚，清楚得多。我知道，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时的那些特别困难、特别令人苦恼的情况。十一月二十四日，当我宣布这个行动的时候，我对比利时议会说，我所承担的责任无疑是在我全部政治生活中所曾承担的最大的责任之一，也许，确是最大的一个。我现在仍然认为是这样，也相信是这样。当我还不知道那次军事行动如何了结，而又已经知道那天上午在斯坦利维尔发生屠杀事件的时候，我说过，我不知道将来对我的行动最后会怎样裁断，但我自问——在这里，在国际听众的面前，我对你们重复这句话——我必须把这话告诉你们，我问心无愧，并且自信，在承担那些责任上，我尽了我的义务。

63. 现在我想从比利时对刚果的一贯政策来评价斯坦利维尔事件，并向你们证明，侵略的概念同我所想的和所做的一切是相反的。

64. 可是，我得首先回答加纳代表在这里的发言。他讲到我国时，提到对刚果人所犯下的一个世纪的残酷罪行。我不知道加纳代表是否熟悉刚果历史。我的想法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过光辉的一页，也有过黑暗的一页；而我决不打算坚持说，十八、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殖民主义现象所有的只是光荣的篇章。我倒是充分意识到，那个时期已经终结了——我不妨补充说，幸好终结了。我确实知道的事实使我相信加纳代表的说法是夸大的。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刚果人——我现在认识许多刚果人——经常清楚地表明他们要继续同比利时人和睦相处的意向和愿望。如果真的可以用“一个世纪的残酷罪行”这样的话来概括比利时殖民的历史，我不相信这种友好的感情在经历了种种事态变迁以后还能存在。

65. 今年初我到利奥波德维尔去，我受到的接待使我极为感动。我在城里随处走，我对许多群众讲话。我受到利奥波德维尔各郊区的市政长官们的接待。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对我说，他们为我的访问——从一九六〇年的事件以来第一个回到刚果来的比利时大臣——而感到多么高兴。他们多么希望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他们还向我保证——有时用了太过分夸张的词句说：“刚果不能没有比利时人的援助和友谊而存在下去。”我深有感触，也深受感动，回到我的国家决心再作进一步努力来帮助刚果摆脱它的困难。

66. 我以前认识阿杜拉先生，现在认识冲伯先生；我同格贝尼先生也曾有过来往。我虽接触过许多其他的刚果政治家。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中有那一个人不是那样说的。那个也许是最热情的——我现在不得不认为他也许不完全是真诚的——是格贝尼先生。去年八月我在布鲁塞尔同他会见。当我们讨论到刚果该怎么办的时候，他谈了许多事情之外，还对我说（我以荣誉保证他是这样说的）：“在刚果该怎么办，非常简单：在一个独立的刚果，象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比利时的行政管理当然必须重建。”那是超出了我询问的范围，真的，也超出了我力所能及的范围。

67. 尽管如此，在作出象这次如此粗暴的——请允许我说——如此带侮辱性的历史的裁断之前，当一个人有荣誉和责任在这样的一个大会和这样的一个讲坛上发表言论时，难道不应该至少稍为衡量一下他的措词，使他对安全理事会的发言同他在自己国内的一个政治集会上所使用的语言有所区别吗？

68. 在刚果我曾试图做的事，除了帮助利奥波德维尔政府制止了加丹加分离之外，就是给予刚果政府技术援助，并经诸多犹豫之后，给予军事技术援助。当时骚动开始了，叛乱扩大了，我经常声明必须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而不能用军事解决办法来对付刚果的叛乱。在阿杜拉先生任总理时我这样做了。在冲伯先生任总理时我也这样做了。最后的办法，我寻求非洲赞助比利时对刚果外交政策，希望通过同非洲统一组织的良好关系，使我试图做了的事在非洲会得到理解。

69. 所有这一切同军事侵略的观念完全不同。现在，假如你们许可，我将简短地重述一下其中的一些要点。

70. 我希望帮助利奥波德维尔政府。我请你们注意我对加丹加省分离的直率的谴责。我提醒你们想想我跟冲伯先生在长年累月中曾经发生过的困难、辩论、纠纷和争端，以及我为赞助联合国吴丹秘书长拟订的计划²所作的努力，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不妨说，要是加丹加省的分离结果在大体上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制止了，部分是由于我的努力。

²同上，第十七年，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 S/5053/Add.13。

71. 我不准备谈比利时给予刚果的技术援助，但要详细谈一谈关于军事技术的援助，因为，在我看来，它引起了三个问题：第一是被指为比利时对刚果事务的干涉；其次——我遗憾地说——是非洲国家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最后，是这种援助的有限性质。

72. 我认为有必要结束含糊不清的说法，而且——恕我这样说——要结束一定程度的伪善的表现。我想清楚地、彻底地了解不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原则的含义。我不想沉迷于争论之中，所以我将不作任何举例，这些事例在我看来是需要某种解释的。我只准备谈一谈我本人对不干涉原则的理解。

73. 对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提供所要求的援助，那就不是干涉一国内政。对反对合法政府的叛乱或革命给予支援，那就是干涉一国内政。如果任何人能向我们提出一个对不干涉的不同解释或不同定义，我希望他提出来，因为我认为，为了一个健全的联合国的利益，我们应该彻底地懂得不干涉的含义。

74. 而且，过去人人承认阿杜拉政府，但有一点至今仍然使我有些迷惑不解，那就是：甚至连现在说尽冲伯先生坏话的那些国家，依然还承认它。就我所知，曾经在这个讲坛上接二连三发言的各个代表团都同冲伯政府有正常的外交关系。正如象牙海岸的代表所指出的〔第一一七〇次会议〕，卡萨武布先生和冲伯先生的刚果政府是合法政府，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都有它的代表。那么，你们指望象比利时政府这样一个政府能怎么办呢？例如，是不是要它说：“我把技术援助，甚至军事援助给阿杜拉政府。现在政府变换了。另一个政治家接过了政权。好啦，我得停止给予技术援助，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政府；因为我有一个人在刚果，他是我的人——甲或乙，假如我的人不执政，若是丙或丁掌权，我将撤回我前此给予甲或乙的援助？”

75. 那不是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吗？象比利时政府这样一个政府，它只有不问谁是某个国家的总理或谁在某个国家执政，才能提供技术援助，而不干涉内政。正如我说过的，我很希望把这点弄得十分明确。

76. 我说，在军事援助问题上，非洲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我是不乐意这样说的。一九六二年十二

月，阿杜拉先生找上联合国，并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话。他说：“我的军队组织得很差。有朝一日联合国要离开刚果。我需要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军队。我希望在联合国的照顾下组织它。”那是一个好主意。至于我，当然，我曾经冒昧向阿杜拉先生提供这样的意见。为什么这项作为头等大事而极为必要的刚果军队的重新组织工作没有实现呢？答案是人人皆知的！因为好些非洲国家反对，而人们知道，那些反对刚果总理的请求最力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纳、马里和几内亚。正是这些国家，我们现在发现它们在这个讲坛上就刚果局势作了最激烈的发言。假如在一九六二年，你们不是拒绝阿杜拉先生的请求，而是以你们如此经常地说的、本来当时就应当有所发扬的非洲人的兄弟情谊的精神给他帮助的话，那么，后来的许多纠纷和许多令人遗憾的事就不致发生了。

77. 因为那些国家的原故，秘书长不得不告诉阿杜拉先生，他不能让刚果获得联合国的庇护来尽力发展它的军事组织。因此阿杜拉先生不得不靠双边协定。他求助于比利时。比利时才答应了刚果的请求。

78.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吴丹接见了。我向他说明了我的处境颇为困难。我对他说：“现在是一九六三年五月，联合国部队即将于六月三十日离开刚果。阿杜拉先生的政府处境困难。你认为我能够做些工作吗？而如果我做些工作，你认为我不会违反联合国的法规吧？”我想我可以说，我得到的如果不是直接的赞同，至少不是原则上的反对。无论如何，我是公开行事的；没有任何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论那一个，能说那是出乎它意料之外的，或说对比利时人所要做的努力一无所知。

79. 那种努力是有限制的。为什么不该允许我作一种有限制的努力呢？它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刚独立之后的那个时期要求过并且获得了的。况且，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都曾对那些提出这些要求的非洲国家表示同意并给予支持，为什么刚果要成为这个常规的例外呢？

80. 自然，我要限制这种努力。我对阿杜拉先生说：“当然，这对我们将是困难的。但我们愿意努力加强刚果军队的行政组织，我们愿意努力替你解决后勤的问题；我们愿帮助你设立训练中心。”

81. 后来,当形势变得更严重时,阿杜拉先生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对他的要求,我们作过很多考虑才同意了。这是事实。他要求我们派若干空军,我们对阿杜拉先生的回答是:“我们体会你需要迅速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在你的军队中,可靠的部队很少。我们愿意帮助你运送军队,但比利时人将不参与轰炸和扫射的作战行动。”我可以说,而且肯定没有人能反驳我,从那时起,没有一个比利时空军在刚果参加过扫射或轰炸的作战行动。这就是我们给予军事技术援助的范围。

82. 但事情还不止此。军事技术援助,必须从它政治上的前因后果去考虑。叛乱爆发后,刚果国内的事情变得特别困难。

83. 谈到这里,我认为必须澄清一个误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一个确实严重的历史的错误。那就是一些人所犯的错误。他的假装——我不能用别的字眼——相信目前刚果的叛乱是反对冲伯和它的政府的叛乱。但其真相,可悲的真相却是,这场叛乱是阿杜拉先生任总理时爆发的。我们必须公平。在冲伯就任时就把这场叛乱承袭下来了。

84. 当叛乱爆发时,我完全深切意识到比利时必须克服的那些困难和危险。从那时起,我反复告诉阿杜拉先生说,军事解决是一个坏的办法;或者说得更正确点,这个叛乱问题是不能用军事解决的办法的。恰当的做法是设法求得一个政治解决的办法。

85. 当我必须为说得这么冗长而道歉时——可是我毕竟是单独一个人和在座的各位辩论——我想在这里读一封信的摘要。这封信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写的。那时候,我实在不以为有任何人敢说,我当时写这封信,是为了适应六个月之后我要为之辩护的事件的需要。我没有预言的天才。虽然如此,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我与阿杜拉先生的政府的合作精神。

86. 有时我超出正常的外交途径给阿杜拉先生写私人信件,我对他说:

“鉴于形势发展的情况以及基伍省和克韦卢地区叛乱中心的形势,可能刚果政府也许希望获得比利时技术人员在拟定作战行动方面的帮助。这种行动无疑是打算对付叛乱分子的。我必须坦

白地告诉你,这样的一项要求会使我心中大感不安。一个外国政府在另一个国家参与训练维持法律与秩序的武装是一回事,但是它直接参与系统的镇压性活动则全然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再不属于一件为了改善任何政府所需要的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力量而完成无私的任务的事情,而是积极支持一项政策,因而是分担责任的事情了。

“要不是我万分小心谨慎行事,我早已走上一条会使我在国内外都遇到麻烦的道路,特别是因为我所得到的一切消息中关于这一点——即仅仅用军事方法去缩小目前的叛乱中心的极大困难——是一致的。如果有可能在重要问题上不妥协而能达成政治谈判解决的话,我认为只考虑施加强力压制的措施是拙劣的政策。正如我时常对你说的,我认为刚果需要它的全部精力来满足它伟大的命运,而任何使真诚合作成为可能的措施都应受到鼓励。虽然我不能够断定现在反对你的政府的好几个刚果领袖的声明的准确价值,但他们曾经把他们要求和解同求得目前存在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意愿告诉了我们。正当冲伯先生和苏米阿洛先生以及许多在布拉柴维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说他们正准备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要使比利时更直接地参加全然是镇压的措施是特别困难的。相反,如果有了民族和解正在实现这一普遍印象,那么,凡是对维持法律和秩序能有所贡献的任何事情都会容易办到。关于这点,我认为吴丹计划中的大赦的措施是应该正式采纳的。”

87. 请问,这是一个阴谋策划侵略的人所写的信呢,是一个企图在军事上干涉刚果内政的人所写的信呢,还是一个过去相信而今天仍相信政治解决是刚果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的人所写的信呢?很不幸——而这也表示出我们比利时人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支配刚果政府——阿杜拉先生认为听从我的劝告是不恰当的。

88. 后来,冲伯先生执政了。我知道有一个传说,大意说冲伯先生是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奴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仅是一个传说;我敢说没有任何人

能提供那怕是极微小的证据来证实比利时政府在冲伯先生代替阿杜拉先生这件事中起过任何作用。我从来清楚认识到，挑选总理是刚果共和国总统的特权，不关我的事；而且我不能在刚果有一个看起来是我的人那样的人，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当一个在刚果被人看作是比利时人或美国人的奴仆时——我希望美国人会原谅我这样说！——那个人便失去他百分之七十五的支持者。

89. 我因此确实没有理由想影响刚果总理的选择。虽然如此，冲伯先生终于执政了。我改变了比利时对利奥波德维尔政府的政策没有呢？我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就和解政策和寻求政治解决这两方面来说，我稍微加强了一些。

90. 然而，一桩事件接着发生了，这是曾经站在这个讲坛上猛烈攻击比利时的人都知道的。八月十六日，我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所有非洲国家大使的会议，不但邀请了那些我可以称为友好国家政府——经常给我以忠告的政府——的大使，而且甚至邀请了总是敌视比利时政策的政府的代表和大使。我不想在他们之间作出任何区别，因为我不愿使任何人那怕只是联想到我在试图分裂非洲国家。

91. 我对这些非洲大使说了什么呢？我相信在你们的档案里，在你们各自的首都，一定保存了当时寄发给你们的电报和报告。我说——这一天是八月十六日，当时叛乱正在扩展到克韦卢地区和基伍省以及其他地方——

“对于非洲各国毫无反应，我感到十分惊奇，也感到非常不安。我不知道我们在刚果正在走向何处。但如果事情象目前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将走向更加严重和困难的境地，这无疑对刚果有害，还可能危及整个非洲。因此，我请求你们把这种情况告知你们的政府，并请它们采取行动。”

92. 可能是一种巧合——因为我并不认为我对世界事务有那么大的影响——在八月十六日以后仅仅几天，碰巧一些非洲政府决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一次所有非洲国家的会议。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当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这一届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最后公报发表后，我立即在一次公开声明中表示：

我欢迎这个公报；我希望非洲统一组织能够成功；我愿在任何情况下为它尽力，并准备同它合作，如果它认为有必要的话。我承认，那时我认为不仅会在华盛顿向美国人质询他们对刚果的政府，而且也会要求比利时人作出某些解释。对此，我曾经作好了准备，而且确实热望加以解释，希望同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密切合作，正如我过去所做的那样。

93. 在这里，再一次我要问：这种向非洲各国的呼吁，难道是企图侵略的人的策略吗？

94. 我也做了一件也许是大胆一点的事情：我邀请格贝尼先生来布鲁塞尔。我说这是大胆一点，因为当时格贝尼先生似乎是叛乱首领，无论如何，甚至连苏米阿洛先生也要受他指挥。我担负起责任。我要顺便说明，我曾把此事通知了冲伯政府，告诉它说：“我相信政治解决好；我相信和解好。我要邀请格贝尼先生到布鲁塞尔，我想同他会谈。而且，如果我有充当调解人的可能性，我打算不错过这个机会。”格贝尼先生来到布鲁塞尔，而且——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和在这样的时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是在我的政治生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中我能够保守秘密唯一的一次。格贝尼先生来到了布鲁塞尔。我再次同他会见而没有人知道。我同他长谈。我聆听了他的意见。我刚才已告诉了你们他对我谈到他的国家同比利时的关系。接着，我也向他解释了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我们在十分良好的气氛中分手。我对他说：“我将同你保持接触，因为在这样交换意见之后，我们也许能够解决某些问题。”

95. 八月二十六日，我给在乌松布拉的比利时大使发了下面的电报：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同格贝尼先生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两次会谈。我现在派遣专人迅速送给你两次会谈的记录。已经商定：格贝尼先生会同你保持接触，同时我答应给他一个照会，这个照会我想请你交给他。因此，我的意图是获得格贝尼先生和他的朋友对上述文本的同意，并且在那个基础上促成他同冲伯会晤的实现。”

96. 难道这是一个对叛变分子、对刚果策划侵略的人的态度吗？

97. 我不打算把上面提到的那个照会的全文照念了，因为它相当长；但我想把我试图给格贝尼先生的忠告中要点的大意告诉你们（我也知道刚果的现政府对此不会全都喜欢的）：

I. 用武力解决分裂刚果的冲突，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II. 如果内战继续下去，或者如果刚果划分为两个或更多的政治力量，便很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外来干涉。另一个新朝鲜或另一个新越南的产生，对于刚果、对于非洲都不会有任何益处。

III. 既然军事解决根本不可能，或者无论如何总是代价太高，必须找寻另一种解决办法。唯一的办法是在尽可能广泛的和解措施的基础上的政治解决。

IV. 只有当双方对他们的协定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相反地，同意一个积极的行动纲领时，政治解决才可能成立。

V. 没有任何解决方法是完全合法的。无论是“根本法”或新宪法都不能充分执行。新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来自它的存在的事实以及外国对它的承认。要寻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联合政府，因为刚果需要它的一切有能力的人——利奥波德维尔和在各个省份的人。

VI. 这种办法只能作为临时的办法提出来，并将延续至这个国家的和平秩序完全恢复有可能进行选举的时候。在选举之后，就可能恢复一个较为正常的政府形式。

98. 因此，两天以来我从这个讲坛上听到的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一切，都是我早已讲过了的。我这样说，希望不被误解为不适当的骄傲的表现。但是我要说，我是怀着几分自豪而不怕受到反驳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在八月和九月的那些危急的日子里，是哪一个国家下了那么大的功夫设法促成刚果的政治和解、防止内战和寻找唯一仍然可能的解决办法——实现联合的解决办法呢？

99. 必须从那一贯的政策来看斯坦利维尔事件。一个政府或一个人，在好些艰难的月份里，曾经同时

同阿杜拉先生和冲伯先生，并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合作，努力寻找一种可行的政治解决办法，这样的一个政府或一个人，竟然会曾经在刚果搞或希望搞出预谋的军事行动和种族活动，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对我的意图的恶意的诽谤，这种诽谤是没有丝毫——我重复一遍：丝毫——证据的。

100. 这些就是我的解释。斯坦利维尔是我曾说明过的总政策范围内的一次特殊行动。斯坦利维尔事件是一桩惨痛的事件。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在我之前发言的那些人的意见——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刚果的全部问题；在危险中的是刚果的整个前途。除了我已经做过的那些事情之外，还可能做过些什么呢？

101. 当然，比利时对刚果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政策。我毫不犹豫地，在最近几年中，特别是近几个月中，这一想法有时在我脑海出现。那种政策就是放弃一切。那就是某些方面曾经劝告我去做的事情。那就是过去几个星期我同一些国家的代表们谈话时他们给我的忠告。他们对我说：“再不需干预这件事。其他的人都不要管它。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样继续一年、两年、三年、也许四年。那时我们要看看，这个国家还成什么样子——这个国家它本是可以成为非洲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的。”

102. 我们冷眼旁观，让他们打出个明白来，这难道真正为了刚果的利益吗？

103. 我不愿回避任何困难。比利时在刚果确有经济利益。但我想告诉你们——我确实在说真话——目前比利时可以不依赖刚果；但是根据我从会过面的所有刚果政治领袖那里听来的意见，我真的不相信刚果可以不必依赖比利时。现在无可否认地存在着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机构，是经过了四年之后在刚果仍然站得住的唯一的東西。相互更易的政府一直是虚弱的；同时行政管理部门几乎不存在了。但是，由于有了它的经济结构，刚果一直生存下来。今年三月，我同阿杜拉先生达成了若干协议，如果得到批准，将使刚果人成为他们所有的矿山、所有交通运输工具和所有电力的绝对主人。有了这一切，刚果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刚果就能成为一个繁荣和富裕的国家。这就是比利时的恳切愿望。但愿能使我相信，绝对相信，毫无例外，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的真诚愿望。

104. 比利时既不是殖民主义者，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者，也不是帝国主义者。比利时既不是残酷的，又不是种族主义的。比利时的外交大臣自豪地在这里作出这一正式的和庄严的声明。比利时政府准备同联合国合作。比利时政府准备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比利时政府准备同刚果的合法政府合作，目的是帮助它克服它的种种巨大的困难。而这并非夸口，并非夸张之词，而是真正为了和平、为了各民族间的友谊、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情谊而努力。

105. 主席：我要感谢比利时外交大臣。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06. 伊宗布伊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我国代表团有机会在这次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中发言，感到极为荣幸。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在我们国土上发生的一些事实和事件加以说明，以便使安理会的代表们对这些事实和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

107. 我不打算提醒你们联合国所赋予安全理事会的职责的重要性。我只想说，要履行这些职责，就要求你们以及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信任联合国宪章。这个宪章规定了各种机构可以起作用的范围和定出了各会员国行动的界限。换句话说，它确立了若干基本原则。尊重这些原则，是维护和平所必需的，而破坏这些原则，则难免对和平造成威胁。既然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和平得以维持，你们就必须保证这些基本原则受到尊重。我国代表团深信，安全理事会将会一如既往，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在我国——这个国家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历史上的困难和痛苦的时刻，它也将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它本身的传统行事。

108. 研究了直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的发言，使我考虑到下面几点：第一，美国-比利时的营救行动，这个问题与我国的主权有关；第二，叛乱问题——即武装反对共和国的合法政府，这个问题与镇压叛乱有关；第三，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提出的非洲政治解决办法；第四，外国单方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内部事务的干涉。

109. 我想摆一下美国和比利时在斯坦利维尔的营救行动前前后后的真实情况。在克复斯坦利维尔前

不久的一段时间，刚果舆论就已经骚动起来了。利奥波德维尔的地方报刊报道了我们的军队故意放慢推进的速度，其原因是考虑到斯坦利维尔的叛乱分子用处死来威胁外国侨民，特别是比利时人和美国人。那时我在利奥波德维尔，所以我知道我所说的是真实的。

110. 有一个事实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军队——它当时实际上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推进到太接近斯坦利维尔，那么，被叛乱分子扣留作人质的外国侨民，他们的命运就会是注定的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出版的小册子刚果的叛乱³附录第十八号载有奥伦加将军打给在金杜的钱达·奥斯卡少校的一份电报的影印件。从这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叛乱分子当时的心情。开头的几个字是电报编号。电文是：“美国人、比利时人必须在安全的地点监护起来。万一该地区受到轰炸，不问情由把他们全部干掉。”正如我说过，这是截获的一份电报的影印件。

111. 而且，当时在利奥波德维尔能够监听得到的从斯坦利维尔发出的无线电讯，都表现了同样的心情。我读其中的一条给你们听听：“美国人和欧洲人将被扣留作为人质，直至冲伯停止使用雇佣军为止。”人质的命运通常是怎样的，我就不用了。

112. 刚果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要么让军队向前挺进，而冒着人质被屠杀的危险；要么停止进军，期望叛乱分子恢复理智。就在这段时间，刚果的舆论变得忍耐不住了。

113. 刚果政府利用这个暂时平静的机会，再三再四地向叛乱分子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允许外国人撤退。联合国秘书长也作了同样的呼吁。非洲统一组织特设委员会也由主席作了同样的呼吁。最后，红十字会的代表——我本人认识他，曾与他交谈，并经常跟他会晤——也曾为这件事竭尽全力。但所有这些呼吁都落空了。叛乱分子宁愿用人命来换取政治利益，如要求承认叛乱政府之类。

114. 正是面对这样惊人的态度和这些办不到的要求，才产生了营救行动的念头。关于这一点，比利时已谣言流传，使刚果的舆论哗然。这里我要再说一

³刚果民主共和国新闻处编，利奥波德维尔，康科尔迪亚印刷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印刷。

次，我知道我刚才讲的事，因为当时我正在那里。这些谣言大谈比利时需要进行干涉，以便营救那些被扣留在斯坦利维尔作为人质的比利时人。于是刚果政府采取了坚决的态度，这是通过政府发言人辛达先生表示出来的。他把任何这一类的单方面的干涉都看作为公然的侵略。这跟某一位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所作出的解释或引用的文句是完全不一样的。接着开始了会谈，结果是刚果政府表示了同意。这已记录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分别给美利坚合众国和比利时驻利奥波德维尔大使的信(S/6062和S/6063)⁴上了。

〔发言人宣读了这两封信。〕

115. 得到刚果政府的允许后，伞兵部队为了特定的目的，以尽可能少的破坏，在指定的地区降落。伞兵部队从未参与对叛乱的镇压。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证明：在伞兵部队撤退后刚果国民军仍继续同叛乱分子作战。现在，伞兵部队回到了比利时；他们在十二月一日就已全部返回了。当他们全部返回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116. 这就是这个营救行动发生前后的情况。现在，你们可以自己判断，这一行动是不是某些人叫做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行动；同样，你们也可以自己判断，这一行动是否能够叫做干涉一个国家的内政。至于硬说这一行动必然使邻国受到威胁，也许我可以承认这一点。但是在所有那些国家中，只有苏丹曾经说过。我要对苏丹的外交部长说，当时只需要在边界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就可以了。无论如何，既然没有任何比利时伞兵部队进入苏丹境内，而这些部队自从十二月一日以来已全部回到了比利时，这一行动只不过使那个国家受了一阵虚惊罢了。

117. 至于刚果(布拉柴维尔)所说的恐惧，由于斯坦利维尔与布拉柴维尔之间的远离，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我也要对这个国家说，既然刚果共和国的领土上已经没有伞兵部队，这也不过是一场虚惊罢了。

118.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当斯坦利维尔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些国家大谈对非洲的威胁；

而当三个东非国家的政府为了扑灭一起叛乱事件要求外国军队进行干涉时，为什么同是这些大谈威胁的国家却又对此保持沉默呢？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违背逻辑的事情。如果这情况继续下去，就会导致我们正在努力去建立的整个合作体系的失败。这里值得引用塞内加尔国务部长谈到刚果政策的评论家时所说的一段话：“人们常常无法看到他们所依据的是什么原则，但人们有时却可以猜得到他们是为什么利益服务的。”

119. 你们将会理解为什么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不可能获得解决我们的困难的有效办法。我们把那些用武力反对合法政府的人叫作叛乱分子；而一些已经承认了我国政府的国家——例如加纳——却称他们为民族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些人称他们为爱国者。当然，无政府主义者和叛乱分子只要留起了胡子，把他们那些评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说教拿来夸夸其谈一番，又从一个确保安全的距离之外煽动一些骚乱，就会成为名牌的民族主义者。我认识几个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一时把胡子刮干净，以便当总理在马德里暂居期间替他效劳；而今天已经变成了民族主义分子，满脸长了胡子，为的是反对他们的总理。这是荒谬的。关于这一方面我将不再罗嗦了，但我希望安理会对叛乱是怎样发展的有一个清晰的图象。

120. 反对前届政府的行动开始出现暴力性质是在国会休会之后。从一九六四年三月起我在利奥波德维尔，在那里，塑料炸弹爆炸的悲惨事件和使用手榴弹对付无辜平民，是反对派表示他们不满所使用的手段。我没有必要详细描述那些可怕的场面，那就是把手榴弹扔进前往投票站途中的人群，扔进参加婚礼的行列，不分青红皂白地伤害男人、女人、小孩。

121. 六月三十日，立法机关的任期已满，国会解散了，国家元首接受了阿杜拉政府的辞职。我应该提到的是，阿杜拉当时还在执政，他也已表示了同意，而同时现任总理在马里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后也已回到了利奥波德维尔。国家元首委托他负责协商工作，后来又委托他组织新政府。他同所有的政治派别进行了磋商，即使那些曾经采用暴力作为反对手段的团体，即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包括在内。他甚至还决定

⁴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前往布拉柴维尔与格贝尼及其他人会晤。要不是布拉柴维尔当局的拒绝，他就已经去了。

122. 实际的情况是：象其他大的政治派别——急进派和非洲民主委员会——那样，民族解放委员会也派出了成员，协助组成过渡政府。这个政府承担了恢复和平、重建经济、继续进行和解、以及为国会选举作好准备等各项工作。这次选举预定在下一年的二月和三月举行。

123. 当时，政府劝告全国人民停止暴力行动，返回家园，消除分歧，并为未来的大选创造必要的和平条件。民族解放委员会内有些人重视这个劝告，返回了家园；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暴力行动停止了。而另一些人却为开头在我国东部地区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所陶醉，宁愿在那些地区加剧了暴力行动。这样，政府除了用暴力来对付暴力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24. 有些人认为应该在这个镇压问题上教训我们。我得承认，听到有些人这样的训责，使我感到吃惊：其实，正是这些教训人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行过并且还在实行对一切反动派的疯狂镇压。

125. 要是我们回顾一下非洲的激烈对抗的一些最近的例子，我们会想到，一九六三年东非的一个国家，当国家元首不在国内期间，发生了叛乱。他回国后，以强硬的手段对这次叛乱，进行了无情的镇压。在这以后不久，我们在那里逗留期间，听到了对这一事件的反响。

126.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个东非的国家请了外国军队去镇压叛乱。有些人在一九六〇年谴责过刚果求助于比利时的军队；但一九六四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特别会议上，同样是这些人却不得不自打嘴巴了。今天，他们对于一个目的甚至不在扑灭叛乱的行动，却热衷于表示虚伪的非洲的愤慨。

127. 一九六四年，黑人难民不断从苏丹涌进我国。他们因北部的阿拉伯当局对黑人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而被迫逃亡。对此，那些假兄弟们却并没有表示任何愤慨。

128. 也是在一九六四年，在刚果的暴力行动爆发很久以前，本·贝拉政权就已经用它的东方朋友提

供的大规模毁灭的武器，对卡比利的反对派进行斗争。为什么这个政权的朋友们不劝告它同那些正在为反对本·贝拉的独裁而战的爱国者们实现和解呢？现在费尔哈特·阿巴斯哪里去了？本·凯达哪里去了？夏阿巴尼和阿伊特·阿默德这两位开头同本·贝拉一起战斗的人哪里去了？前者未经审讯和宣判就被卑鄙地杀害了；后者要不是由于某些阿拉伯政府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者的勇气和信念表示敬佩而进行干预的话，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高于一切的愿望是做阿尔及利亚人；他们不愿看他们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而赢得的独立，被放在银盘上作为礼物奉送给外国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当然，他们将被谴责为把自己出卖给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的反动分子。这样的调子我们早就听过了，而且我们知道这一合唱曲是怎样唱的，又是谁作的曲。

129. 现在在安理会起来表示虚伪的愤慨的那些人，当叛乱分子在他们控制的地区野蛮屠杀整个知识界的优秀分子的时候，他们在安理会一句话都没有说。在金杜、阿伯特维尔、乌维腊、伊克拉、布温德、波利斯及其他地方，凡是拿不出刚果民族运动党（卢蒙巴派）的证件的政府官员和私人团体的雇用人员，都惨遭杀害；这件事我也不必告诉你们了。在那些地方犯下的暴行是如此恐怖，使我一想到是我自己国家的人民要对这些暴行负责时，我就感到羞愧。我只想给你们读一些从目击者那里收集到的证词，其中有些是目击者本人直接告诉我的。当这些幸存者到达利奥波德维尔时，我也在那里。为了那些要把事情弄清楚的人，我还询问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刚果人。

130. 目击者是这样说的：

“尼可拉·奥伦加‘将军’从前的一个心腹让一罗歇·恩冈巴先生转引叛军总司令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人杀了好几百万人。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要照着他们的榜样做。’”

“这些威吓并不是空话。在斯坦利维尔，他们杀害了市长利奥波尔德·马塔博先生，他是在市场上被吃人成性的叛乱分子活活肢解而死的；杀害了省秘书加布里尔·巴列特先生，前内务部

长乔治·科科尼扬格先生，省内务部长官皮埃尔·阿拉马扎尼，曼戈博行政区的区长阿尔弗雷德·博宁戈里，阿拉伯人居住区的首领萨比蒂·马贝，地方报纸公报的总编辑吉罗枚·赞比特，白经教派修道院院长埃蒂安，以及除克里斯平·卢班齐以外的所有法院推事，其中三位推事是极度野蛮的吃人行为的牺牲品。”⁵

131. 关于这方面，我可以向你们叙述一位目击者告诉我的某一居民是怎样在斯坦利维尔卢蒙巴纪念碑下被杀害的。他们剖开他的腹部和胸部，把他的心脏和肾脏掏了出来，当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面把心和肾吃掉了。他们有几个口里还渍满了鲜血，就跑到附近的面包店去拿面包，以便把口里含着的东西更好地吞下去。

“在斯坦利维尔，两千多刚果人——他们是这个地区的优秀分子——遭到杀害：用弯刀砍死、活活打死或活活烧死。城中心的帕特里斯·卢蒙巴纪念碑，成了这些血腥祭品的祭坛。的确，尽管下过赤道地带的急流般的暴雨，这个地点的地面仍然被我们同胞的鲜血染红了。

“一位从斯坦利维尔逃出来的巴基斯坦难民叙述了他的目击情况：

“一天，叛乱分子把一群囚犯带到卢蒙巴纪念碑。所有居民都被迫去看这场可怕的屠杀：有的囚犯被砍掉了脚，有的被砍掉了腿，还有一些被割掉了手或生殖器，然后把这些东西硬塞到他们的嘴里去”。

请原谅我提出了这样的细节，但我不得不把它们提出来。我再引述下去：

“另一天，一位斯坦利维尔的居民被带到离城一百公里的一个地方。他有不少朋友是斯坦利维尔的政府官员。他们开了五枪把他杀死了。他们把他的下身埋在土里，留下上半身在地面上。我们同他的五个朋友到现场去看过，同时还看到了几百个非洲人的尸体……”。

“在曼尼耶马省的首府金杜，有八百多名知名人士和政府官吏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被杀害了……

“在波利斯，韦累省的省长马姆巴耶先生和他的秘书约瑟·塔巴罗先生，以及由西里勒·阿杜拉先生领导的拉德科党的成员、公务人员、教师、法院推事、军事犯等，遭到了集体屠杀。……遭难者的人数，超过了四千人。”⁵

132. 我无需引用从金杜来的一个妇女的证词，她亲口对我说了这件事。这个女人被迫带了她的孩子们去看一桩杀害事件——处死她的丈夫。他们逼他喝下一公升汽油，然后戳穿他的肚子，并在他身上点起火来。他的尸体的碎片象雨点般地落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身体上。

133. 我不想再向你们叙述这些细节了。这里你们看到了这些假兄弟所说的解放是什么货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主张镇压不应该太过分！

134. 请原谅我在叙述这些事实时，竟是如此感情激动。作为一个人，这些事实使我有切身的感受。我出生在这场叛乱——这场武装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我对这件事情的感受以及我对自己家庭的关切心情，是用不着我说的。当我在这里听到人们公开支持那些应对我们共和国东部和北部所造成的悲惨局面负责的人时，我的愤慨你们一定可以理解的。

135.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某些代表团提到了今年九月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所建议的非洲政治解决办法。

136. 我参加了当时的讨论。我觉得有必要对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作出的决议发表一些评论。决议全文如下：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五日到十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第三次特别会议，以讨论刚果问题及其对邻国和全非洲的影响；

“会议研究了一些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打给它的电报，特别是卡萨武布总统打来的电报，他表示相信应该在非洲统一组织的范围内寻求解决刚果问题的办法；

⁵见刚果的叛乱中所引材料。

“注意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政府和布隆迪王国政府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派遣友好调查团到它们的国家去，以谋求恢复一方面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之间，另一方面是刚果共和国和布隆迪王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的方法；

“注意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发表的表示他将为实现他的国家的全国和解而作的努力和愿望的声明；

“深切关注由于外国干涉以及使用主要是从种族主义国家南非和南罗得西亚招募来的雇佣军而造成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日益恶化的局势；

“重申非洲统一组织要求所有非洲国家由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不要同它（南非政府）保持任何关系的决议；”

多么多非洲国家没有履行决议的这一部分啊！我继续引述下去：

“考虑到外国干涉和使用雇佣军已对独立的邻国以及对安哥拉、南罗得西亚、莫三鼻给和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不幸的影响并且对非洲大陆的和平造成了危险的威胁；

“相信刚果问题的解决虽然主要是政治的，但是仍取决于实现全国和解和恢复秩序，”——我要强调这一点——“以便使刚果获得稳定、经济发展以及领土完整的保障；……”

下面是决议的执行部分：

“1. 吁请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立刻停止招募一切雇佣军，尽快地把已经在刚果的任何国籍的雇佣军逐出刚果，以促进非洲的解决办法。

“2. 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作出的对放下武器的战士的安全所作的庄严保证。

“3. 特别要求凡是现在在进行战斗的人停止敌对行动，以便借助于非洲统一组织，寻求一个使得全国可能实现和解，刚果秩序可能恢复的解决办法。

“4. 吁请刚果民主共和国所有政界领袖通过一切适当的办法，恢复和加强全国性和解。

“5. 决定成立一个特设政治委员会，并把它立即派往”——我强调这一点——“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和布隆迪王国；委员会将由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尼日利亚、索马里、突尼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组成，由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阁下担任主席进行有效的领导。特设委员会将负有以下职责：

“(a) 根据上述第2段和第3段，帮助和促进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恢复全国性和解所作的努力；

“(b) 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它的邻国，特别是布隆迪王国和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建立正常的关系。

“6. 请这个委员会向非洲统一组织的行政秘书长提出报告，以便立刻分发给所有成员国。

“7. 强烈呼吁目前干预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所有国家停止干预。还请各成员国向它们派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发出指示，以便使这些国家对这种呼吁获得深刻的印象。

“8. 要求所有成员国不要采取可能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恶化或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它的邻国关系恶化的任何行动。

“9. 要求行政秘书长为委员会提供一切为完成其使命所必要的支援。”

刚才我按照我手头上的影印本向大家宣读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全文。

137. 这个决议在投票表决时，我国政府弃权。决议中关于政治解决的问题、停止招募所谓“雇佣的”志愿军、停止敌对行动、建立特设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如何完成任务等等需要澄清一下。

138. 我国代表团必须指出，在引言中谈到政治解决的一段，把和解与恢复秩序联在一起而且使恢复秩序成为和解的条件。在这里，我们中谁都不会断

言，在国民进行武装反抗合法当局的地方，社会秩序可以维持。

139. 关于停止招募那些被叫做雇佣军的问题，我们必须离开话题把情况讲清楚。

140. 今年九月在亚的斯亚贝巴，总理要求部长理事会同意任何一个受到共和国政府要求的非洲国家可以向该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维持平靖地区的秩序。

141. 部长理事会声称它的责任不是干这种事情的；但另一方面，它却表示要把在我们军队中服役的那些个人应募的志愿人员立即清除出去，而且不准替补——就在此时，我们的军队正要对付一个也有武装的反对派。那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拒绝了前者就使后者无法实行。可是，有人本来想要非洲统一组织不经刚果同意而强使军队开进刚果。从哪些来源就会找到雇佣军，那是容易猜想的；例如，从一个非洲政府，它在它的国家担负了非洲使命这一似是而非的借口下，经常随意宣扬雇佣军。这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142. 而且，这个决定规定了我们必须停止招募任何国籍的雇佣军，并尽快把所有那些已经在刚果的清除出去。我强调“任何国籍的”这几个字。要我们清除那些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倒是容易，但我们也要找出并清除那些可能在叛乱分子控制之下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控制我们全部国土，决议中执行部分的第1段所赋予我们的义务，就难于完全履行。

143. 至于执行部分的第3段所指的停止敌对行动，我国政府和其他政府正确地指出，不能把停火强加给一个正在对付武装叛乱的政府。因此，“停火”这一词才从文本中删去了。尽管如此，“所有现在在进行战斗的人”等字眼仍然保留下来，但要联系到执行部分的第2段来理解，这一段说及政府要保证那些放下武器的战士的安全。

144. 我现在要谈执行部分的第5段，它论及特设委员会。在这里必须提到这个委员会，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对非洲统一组织的部长理事会负责的委员会，我认为我自己只有对那个理事会才有权评论它。可是，因为那些被某一新闻记者称为

非洲先锋队的人们已经讨论到它，因此我才不得不也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145. 特设委员会接受了如下的职责：“(a)根据上述第2和第3段，帮助和促进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恢复全国性和解所作的努力；(b)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它的邻国，特别是布隆迪王国和刚果共和国(布)建立正常的关系。”

146. 关于刚果问题，部长理事会切望特设委员会立即——我要强调“立即”这个词——访问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布隆迪和刚果(布拉柴维尔)。这些是决议中的条款。

147. 特设委员会干了什么呢？它迫不及待地派出一个小组委员会到华盛顿去，而它自己则拒不开内罗毕，把自己限于发出那些根本无效的停止敌对行动的呼吁——那些呼吁根本无效。

148. 既然刚果政府频频邀请，他们为什么不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呢？为什么它不去斯坦利维尔要求那些叛乱的首领停止战斗呢？当伊克拉、布温德和其他地方刚落在叛乱分子手里，而科基拉维尔受到了威胁时，为什么那个委员会不提出抗议呢？当时公职人员和商号雇员在布温德、伊克拉和斯坦利维尔正遭叛乱分子的屠杀，为什么它保持缄默呢？

149. 可是，现在斯坦利维尔陷落了，叛乱的首领们乱作一团。数以千计的战斗人员已经放下他们的武器，沮丧、失望，在危难中被他们的首领抛弃了。那些首领却从容不迫地在别的地方把他们的大量黄金储存起来好去旅游，并住上豪华的旅馆。这时，委员会突然起劲起来。自从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会议以后，它一直感觉没有开会的必要；而今却一下子召开一次十万火急的会议，因为斯坦利维尔这个叛乱的根据地陷落了。

150. 有关到华盛顿去的任务问题，我要说特设委员会派出一个小组委员会到那里去，是超越它的权限的。当然，特设委员会的决定是根据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这段有如下的一句话：

“强烈呼吁目前干预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政的所有国家停止干预。”

讨论这一段时——我参加了那次的讨论——有一个代表团希望明确指出哪些国家是在进行干预的。部长理事会拒绝接受这个观点，听由各国自行负责向适当方面提出呼吁。特设委员会对部长理事会规定的职责的那一部分置若罔闻，胆敢超越部长理事会指示的范围，擅自包揽理事会已明确地交给各会员国的责任。

151. 因为这些不同的态度、这些违背逻辑的事情——我希望，它们是由于我们非洲统一组织尚属年青而产生的，因而是暂时的——即使在非洲统一组织之内，对刚果这一棘手问题，也难取得立即解决的办法。一些建议在理论上极好，但在非洲统一组织之内，我们并非大家都有共同的语言，也就难于实行。

152. 产生了这样的局面，我感到遗憾；如果我不扮作鸵鸟，我必须提请大家注意这一个局面。刚果问题必须在那些尊重刚果的主权而不试图把它置于这个或那个组织托管下、并愿意同它合作的人们的帮助下，由刚果人，而且只有由刚果人自己去寻求解决办法。

153. 关于特设委员会，我就说到这里。我的意图只想说明这个许多发言人都曾提过的决议通过的始末，特别因为我们面前的文本里面有缺陷，一看就可能使人怀疑其中早就有若干故意的疏漏。

154. 我听了前面几个人的发言，听到他们所援引的外国报纸和外国新闻通讯社的材料，在这个问题上，容许我象他们那样来谈一谈。我碰巧读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青年非洲第二一〇期，其中第6页有一篇文章是一位非洲记者西蒙·马雷写的。这位记者来自突尼斯，因此他对非洲所发生的事实和事件知道得比较清楚。让我们听听这一篇有启发性的文章吧。题目是：“非洲的答复：在刚果的直接行动。十个非洲国家向冲伯宣战”。下面是原文：

“上次在开罗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有一批非洲国家首脑通过了一些‘绝密’的决定，其中之一已经付诸实施。这是近来比利时—美国在斯坦利维尔进行干涉的最重要结果。有一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专家和顾问’刚离开了开罗前往非洲一个‘名称未详的目的地’。约有一百名来自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加纳和苏丹的高级

军官‘在活动中’，同时，一大批来自好些非洲国家供游击战用的军火，也在运送途中。此外，四个与刚果接邻的国家，已决定让它们的领土，供格贝尼革命政府作任何必要的军事准备使用。这些国家是刚果(布)、乌干达、坦桑尼亚和苏丹。”

这是不附任何条件的。

“这样非洲终于决定作出反应和采取直接行动。这些先锋国家将不再等待非洲统一组织的决定”，——有人叫我们去向这个组织寻求解决办法——“也不再容忍那些国家，如尼日利亚，为比—美军事干涉进行辩护和解释，正如尼日利亚外长贾贾·瓦丘古最近所做，或者象它驻联合国大使阿德堡曾试图去做的那样。

“秘密会议。——正是在开罗，在莫迪博·凯塔和本·贝拉倡议下，出席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一些非洲国家首脑，决定召开一个秘密会议。关于这个会议全世界报纸至今还没有详细的报道，甚至连举行过这个会议的消息也没有”——这是优先权的问题。“这个‘会议中的会议’的目的，在于订定未来的几个月要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对付威胁刚果的阴谋。

“参加这一姑且叫做‘战争会议’的人，是纳赛尔、本·贝拉、凯塔、杜尔、恩克鲁玛、尼雷尔、肯雅塔和马森巴-德巴特。”

我继续引述下去：

“结论。——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这里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第一，刚果的冲伯政权的存在威胁着所有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国家其革命的或进步的政权是西方大国忧虑的根源。冲伯政权一旦巩固下来而又清除了‘叛乱分子’，它就很快会变成一个反革命的根据地，在那里将策划出并策动各种反对‘不受欢迎的’国家或政权的阴谋诡计。由于冲伯那时将会得到充足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利奥波德维尔就会变成一种‘癌症’，它的祸害可以很容易地扩散到整个非洲。上述说法，无论如何是马森巴-德巴特、尼雷尔、本·贝拉及其他的人所作的分析。”

这仍然是无条件的。

“在开罗：‘他们’太强大了。——第二个结论是要作长期的准备直接援助格贝尼政府，而且要比前几个月更为充足。虽然若干非洲政府已经给它供应了军火，装备和财政援助，斯坦利维尔显然还不感到满足，强调需要更大和更有实效的援助。纳赛尔主持会议，他声明开罗将立即使刚果革命武装获得一批装备完善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本·贝拉也宣布阿尔及利亚的援助，就有关游击队的军火和军事训练的专家方面而言，阿尔及利亚的援助将增加一倍。”——增加一倍，这就意味着援助早已开始了——“莫迪博·凯塔说，几个军事专家将从马里派到某些与刚果毗邻的‘友好的’国家去；而且，如有需要，‘我们的志愿军也将参加战斗’。”

我们的志愿军，不提及任何雇佣军。

“其次，恩克鲁玛最后讲到非洲统一组织，他说：‘那是明显的，当前就非洲的情况看来，非洲统一组织不可能采取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行动。我们的几个对手们是太强大了，而且有太多方法去破坏那些旨在使非洲统一组织免于瘫痪的各种努力。因此，尽管我们不能达到全体一致，也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们决心保卫非洲的那些人取得一项协调的政策，反对外国策划而为某些非洲人所‘容忍’的阴谋。’”

155. 这篇文章是一个不能被谴责为怀有偏见或消息不灵通的人所写的，听过这篇文章的叙述，安理会也许觉得有所启发吧。

156. 还有一条法国新闻通讯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从喀土穆发出的电讯，它援引苏丹官方新闻通讯社的话说：“喀土穆政府已经批准在苏丹避难的刚果反对派成员在苏丹国土上进行军事训练。”

157. 本·贝拉政权的首脑好象没有受到国内经济混乱的挫折，而认为通过向“黑”非洲输送雇佣兵，就已经替自己的问题找到了马尔萨斯式的解决办法了。他故作愤怒地叫喊说：“我们将继续输送武器和志愿兵。”我引用的这条法国新闻通讯社第一五六号电讯，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从阿尔及尔发出的。

158. 所有这些话都出自那些宣称关心非洲和平的人之口。我必须说：这是寻求和平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方法。他们毅然单方面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违反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然后装扮成无辜的羔羊到安全理事会来。我希望安理会不要被那些家伙的诡计所欺骗——他们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也门、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尔及利亚，甚至也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的争端中。他们还一贯地企图依靠武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是非洲“门罗主义”的一种古怪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一方不准他方干涉自己的事务，而它自己却已为干涉其他大陆的事务作好准备。

159. 答复当然是：这些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事务，我作为一个非阿拉伯人，对此是无权过问的。完全正确。但为什么他们又在干涉非阿拉伯的非洲的事务呢？我不必告诉大家：在联合国上一届大会中，非洲国家集团决定向第一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在某些联合国机构中分配席位时为非洲保留若干席位，当时一个自称属于非洲的国家把这个集团吓了一跳，至少是把其中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吓了一跳，因为它要求在分配席位时应把一定数目的席位留给阿拉伯集团。这是今日的非洲，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非洲，但很不幸，有些人却闭眼不看它的真实情况。我国代表团却不得不正视这个明摆着的事实。

160. 有些人认为应当把这些问题当作种族问题来讨论——这无疑是对总理没有参加开罗最高级会议⁶和不结盟国家会议⁷所作的解释。在设在非阿拉伯领土上的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就没有发生这个问题。

161. 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关于某一政府首脑在开罗所遭受的粗暴待遇。按照国际法，这完全可以作为开战的理由。所用的借口自然是开罗的外交人员曾受到虐待等等。当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时，我立即亲自关照安排他们撤离。一切在完全平静中进行，并最严格

⁶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常务会议（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

⁷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开罗举行）。

地遵循了外交惯例。联合国驻刚果的代表可以对此作证。我本人，在取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大使的同意之后，邀请他到现场来，避免有关这件事虚伪报道的散布。当天，大使馆既有水又有电，但一个外国无线电台却散播了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外交官员被切断了水电的供应。不，我们不会对我们的非洲兄弟那样干，即使他们是阿拉伯人。

162. 但种族主义真正变得露骨的地方还是：欧洲和美国的白人因为向黑人的军队提供武器而受到谴责，其理由是黑人军队会用这些武器去打他们的黑人同胞。我不禁要问：北非的白人要向斯坦利维尔的黑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这些武器是否就不会被用来打他们的黑人同胞？

163. 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很抱歉，我用这样坦率的词句，但逻辑迫使我作这样的揭露和宣告。七十年前的刚果的历史还不容许我们忘掉大规模贩卖我国的黑人同胞这回事，这种贩卖黑人是在北非的白人和欧、美的白人之间进行的。在今天的美国黑人中，我们天天都看得到这种后果。

164. 我们要摆脱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做非洲人，希望做世界的公民。但我们首先必须尊重自己，把人当作人来尊重，不管他是什么肤色。这是我向一切白人发出的呼吁，不管他们是在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或非洲的。

165. 现在我提出我的结论。

166. 比利时和美国的干预是在取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干预以人道主义为目的，并且只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进行。十二月一日这个干预已告结束。它是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

167. 至于叛乱，确是存在的，但它正在内部加以处理。可是它得到某些要从这样的动乱中图利的国家的支持。吉罗莫多的黄金正从它的合法所有者刚果政府那里被抢走；同时，某些国家正从钻石的贸易中发财。请允许我告诉你们关于一位大使的故事：他声称他的国家是钻石的最大生产国；它当然是钻石的最大输出国，但它所输出的钻石全部是从刚果共和国搞来的。咖啡被非法地运到某些邻国去；这些邻国以人

员、武器和训练设备支持叛乱分子，从而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关于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条款。你们是和平的保卫者，知道这样的干涉是打算扰乱和平的；你们应该按照宪章的原则谴责这种干涉，要求尊重刚果的主权，并宣告刚果对于这些内部争端有自行解决的能力。

168. 指望非洲统一组织是荒谬的。如果认为存在着对和平有威胁，那么，安理会就应根据自己的职责，召开会议，从而提出使人满意的建议；如果认为不存在这种威胁，那么，安理会就没有召开会议的必要，即使这样的会议只是为了确认某一些区组织的威信。在我看来，这不是安理会的职责。我们这一地区组织的威信，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关照。

169. 再说，没有必要去证明非洲统一组织并不把美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干涉看作一个长期的、严重的和迫在眉睫的威胁。本来要举行的最高级紧急会议，也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而没能开成。

170. 还有，如果安全理事会为了确认某一组织的威信，或为了谴责一些过去的对某些国家的威胁，而不得不召开会议的话，那也应由安理会常会去解决。

171. 不是；现在我们的主权存在着真正的、紧迫的和严重的威胁，因为某些国家已经决定对叛乱分子给予或正在给予军事援助。我恳请你们认真对待这一威胁，并作出相应的必要建议。对不起，我说得太多了。主席先生，在辩论中，如有必要，如果你允许我再次发言，我应当表示谢意。

172.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但象牙海岸代表团在听了上面的那些发言以后，认为它有责任提出如下的声明。

173. 错误地从种族的角度来看我们面对的这个 问题，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显然，我们可能早已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了试图替所讨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就是因为报刊要寻找耸人听闻的新闻：在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被看成是非洲人的吃人风习和白种人等着被吃的问题。就这样，甚至在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以前，就已经制造出一种有戏可看的气氛来了。我相信安理会一定不顾这种激动的情绪，而恢复问题的本来面目。

174. 我们所争论的是一个正常的外交概念的问题：即关于一个国家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但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安理会所要研究的，应该是采取什么方法和步骤，以保证国际法所公认的这个法律概念得以付诸实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理会就必须抛弃任何主观的想法。

175. 其次，象牙海岸代表团认为有责任申明：在非洲里面，在非洲人之间，不存在种族问题。当我们提到非洲，或提到非洲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整个大陆。在论及非洲大陆的问题时，我们不应允许任何种族概念被偷偷塞进我们的辩论里面来。

176. 巴巴先生(摩洛哥)：摩洛哥代表团深深感谢象牙海岸的代表，因为他提出了我们要求发言时想要说的话的实质。

177. 摩洛哥代表团对于今天早上以来辩论所表现的倾向，实在感到有些不安。我们认为，问题是限于某些无可争议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应是安全理事会进行客观和公正的研讨的主题。

178. 当我听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任意使用一种概括性的说法并多次重复“北非的白种人”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更加感到不安。我认为，这种概括性的说法，是以主观设想为根据的；这种说法，无论在非洲的南部或北部——显然除了南非联邦和南罗得西亚以外——都是被断然否定了的。正如象牙海岸代表刚才说过的，非洲是一个大陆，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们被人类生活极为遥远年代的历史纽带联结在一起，他们都碰到不发达、求解放和要复兴的共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却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走兄弟情谊、团结一致和相互谅解的道路。

179. 不幸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还提出另一种概括性的说法：他竟然胆敢编造历史谎言，说什么同美洲进行的奴隶买卖是通过北非去做的。我还是

让历史学家去弄清楚这个问题吧。我们都知道，对当时在非、美两个大陆之间从事可恨的奴隶买卖的人来说，特别吸引奴隶贩子们的兴趣的是非洲的哪些地方。

180. 我还必须指出，作为一个位于北非的非洲国家，摩洛哥对以种族为根据的主观概念会对我国的政策——国际范围的或非洲范围的——产生任何影响这一观点，从来不接受，将来也不接受。

181. 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非洲解放和发展的敌人总是寻找机会来散布分裂因素。他们不但通过种族观念，还通过部族观念和地区观念来这样做。这是殖民主义者对待非洲的最卑鄙而又最危险的手段。

182. 我还认为我有义务指出，正如我们从那些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提出申诉的人中可以看到的，非洲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不存在两个非洲。我们最强烈地反对制造几个非洲的任何企图。

183. 我们认为，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结合，非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非洲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带头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不会有人因为它们的这种作用而批评它们。如果有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肯定只能产生于那些现在幸而被赶出非洲的人——那些长期以来用最可恨的和不可饶恕的方法，用贩卖奴隶、损人自肥或进行经济和政治剥削，以榨取非洲人民血汗的人。我认为任何非洲人，即使仅仅由于他的肤色而被称为非洲人的人，他对非洲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不论在非洲范围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不去讲象几分钟前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不幸而讲出来的那种话。

184. 主席：今天上午和星期一上午都没有人要求发言。因此，我建议安全理事会休会，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再开会。

下午一时五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